

大家讲谭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周振甫 著



楚尘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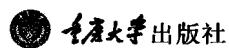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家讲坛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周振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 周振甫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1

(大家讲坛系列)

ISBN 978-7-5624-5766-4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②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5687号



清华大学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wenxindiaolong ershi'er jiang
周振甫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 1/16 印张：16 字数：154千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766-4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编选说明

周振甫先生生前曾对我们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当了一辈子的编辑，做了一点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

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成功的。1987 年中国出版家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他 80 岁时，曾为他召开了一个“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 50 年大会”，表彰他 50 年来从事编辑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出版界的领导和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钱锺书先生都到会祝贺并讲了话。钱先生说：“振甫和编辑工作的关系是 50 年，我和振甫的关系是 40 多年。10 年、20 年、30 年、40 年，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愈好。”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启功先生用朱笔画了一幅《松竹图》送给周先生。那一丛挺拔的幽篁，是虚心高洁之美的象征；那一挺铁干虬枝的老松，则是轩昂坚贞之气度的写照。出版界的领导王子野先生，著名学者、资深编辑杨伯峻、刘叶秋等先生还当场题词赋诗：

五十年如一日，甘当无名英雄。

——王子野

生平博览岂辞劳，五十年来千丈毫。
稿件编排随意笔，辞章剖析解牛刀。
谦恭足比陈文象，敦厚真如龙伯高。
今日见闻尤可乐，座中不乏方九皋。

——杨伯峻

一代雕龙手，丹铅五十春。
品缘谦益重，情以朴能真。
发蕴文心古，探幽诗话新。
翛然安斗室，不见画梁尘。

——刘叶秋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都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一位编辑召开这样隆重的大会，是没有先例的，在当时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而对出版界产生的影响则更大。

1997年，周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主持人请他谈谈60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给年轻一代传授治学之道。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把古代的一些好东西，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大家，做了一点普及工作。

周先生说他只做了一点普及工作，其实他做的普及工作，还是不少的。他把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两部经典著作，《诗经》和《周易》作了译注；他把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作了注释

和今译，还主编了《文心雕龙辞典》。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又深入探索古代文论史，写下《中国修辞学史》、《中国文章学史》以及《文论散记》、《文哲散记》、《文论漫笔》等著作。并用“例话”的形式，把深奥枯燥的理论，用生动活泼的例子，作深入浅出的诠释，写下《诗词例话》、《文章例话》、《小说例话》、《风格例话》，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文独特的评析系统。其中《诗词例话》自1962年出版后，风行海内外，累计印数达70多万册。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专谈写作艺术的书籍还很少，《诗词例话》就成了当时大学文科学生、广大文艺爱好者进入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大门的一把钥匙。一本文艺理论的读本，印数竟如此惊人，仅此一例，足以说明周先生做的普及工作是成功的。

关于实事求是，说来话长，应该有专文来谈，这里举几个事例来说说。凡是了解周先生的人，都说周先生做人做学问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

例如《诗经·伐檀》中有一句话，“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现在，中学课本都讲成君子都是白吃饭不干活的，是作为反语讥讽。通行的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也都是这样讲的。周先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认为称白吃的为“尔”，称不白吃的为“彼君子”，认为旧的解释较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详见《古代诗词三十讲》中的《诗经·伐檀》的分析。）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嵇康的被杀，表面上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累嵇康，实际上因为他说了：“非汤武而薄周孔”，影射了司马昭的篡位。周先生写了《嵇康为什么被杀》，对此事详加考证，认为嵇康被杀，不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主要是吕安给他的信，要推翻

司马氏政权，跟钟会诬陷他要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氏所造成的。

1986年，周先生的《诗文浅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收有一篇评析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文章。到1994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先生另一本《诗文浅说》。周先生在《诗文浅说》的后记中说：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称“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查中华书局本《柳宗元集》是据《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标点的，这本子里对“卷石”没有注，再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卷石”也没有注。因此，我把“卷石底以出”解作“潭底石头翻卷过来露出水面”完全错了。原来这个“卷石”的“卷”读quán。“卷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区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器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原来“区”是齐国的度量单位，一区等于一斗六升容量，卷石，指相当于一斗六升容量大的石头。在上本书《浅释》里注错了，特向读者道歉。

为一句话，特向读者公开道歉，反映出周先生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再说一件事，就是对毛主席诗词中的两个字，提出修改意见。这件事周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连家里的人也不知道。直到逝世前，他才披露这件事。他在《我的编注生涯》（1999）中，是这样淡淡叙述的：“（1956）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臧克家先生约稿，约他的《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先生要出版社约人加注。出版社领导就找到我。我看

不到毛主席的诗稿，只看到《诗刊》上发表的毛主席的诗词。注到《菩萨蛮·黄鹤楼》的‘把酒酌滔滔’，写信给臧先生，说《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是以酒奠江月。毛主席酒奠滔滔江水，当作‘酌’，怎么作‘酹’字呢？臧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主张用‘酌’字。……等注到《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又写信给臧先生说：山盖上雪，用‘银’字来形容。原盖上雪，应用‘蜡’来形容，为什么作‘腊’呢？臧先生同意‘蜡’。……后来他见到毛主席，谈到改‘腊’为‘蜡’，主席也同意了。”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周先生能对毛主席的诗词提出修改意见，很能说明他做人的正直，做学问的实事求是。

本套书系汇集了周先生有关文论、修辞和诗文鉴赏的文章，编成《〈文心雕龙〉二十二讲》、《怎样学古文二十五讲》、《古代文论二十三讲》、《古代散文十五讲》、《古代诗词三十讲》、《修辞学九讲》六种读本。本系列中的文章，写于1956年至1999年，如《通俗修辞讲话》写于1956年，其中的用语，特别是例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尊重历史，未敢改动，其他的文章，也是如此。由于选编仓促，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名馨

2010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 第一讲 我与《文心雕龙》 / 1
- 第二讲 谈《文心雕龙》 / 9
- 第三讲 《文心雕龙》论文德 / 56
- 第四讲 谈刘勰论“文之枢纽” / 62
- 第五讲 《文心雕龙》的《原道》 / 72
- 第六讲 刘勰《原道》献疑 / 78
- 第七讲 刘勰论“神思” / 84
- 第八讲 释刘勰的“风骨”与“奇正” / 97
- 第九讲 谈风骨 / 112
- 第十讲 刘勰论“物色” / 117
- 第十一讲 刘勰论文讲气 / 129
- 第十二讲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 136
- 第十三讲 《文心雕龙》的声律论 / 146
- 第十四讲 谈刘勰的“变乎骚” / 149
- 第十五讲 从《时序》看刘勰的创作论 / 161
- 第十六讲 谈《文心雕龙》中论说和抒情的写作 / 169

- 第十七讲 刘勰谈创作构思 / 192
- 第十八讲 刘勰的文学论 / 201
- 第十九讲 《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 / 211
- 第二十讲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同一错误 / 220
- 第二十一讲 《刘子》与《文心雕龙》思想的差异 / 223
- 第二十二讲 刘勰论文的局限性 / 236

第一讲 我与《文心雕龙》

我接触《文心雕龙》是从 40 年代（20 世纪）开始的，我刚进上海开明书店，是帮宋云彬先生校对《辞通》。《辞通》出版后，我又帮章锡琛先生校对《文心雕龙》。锡琛先生当时是开明书店总经理，他在空余时间，也做整理古籍工作，开明书店出版范文澜先生注的《文心雕龙》，就是锡琛先生整理的。锡琛先生在书末还写了《校记》。《校记》中说：“余友范君仲沄（即文澜先生字），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又称：“最近得涵芬楼影印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东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太平御览》，偶加寻检，其中所引《雕龙》文字，颇有同异。尤足珍者，如《哀吊》篇‘汝阳王亡’，注谓‘汝阳王不知何帝子’。今此本‘王’作‘主’，则是崔瑗作《哀辞》者，乃公主，非帝子。《史传》篇‘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注谓彦和用《玉藻》说。此本作‘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则用《汉志》说。《论说》篇‘仰其经月’，注谓疑当作‘抑其经月’，此本果作‘抑’。又如《颂赞》篇‘义兼’之为‘赞兼’，《诔碑》篇‘改盼’之为‘顾眄’，《史传》篇‘同异’之为‘周曲’，‘违败’之为‘屯贬’，《章表》篇‘盖阙’之为‘然阙’，《书记》篇‘遗子反’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之为‘责子反’，‘激切’之为‘激昂’，《神思》篇‘缀虑’之为‘缀翰’，《指瑕》篇‘颇疑’之为‘颇拟’，义胥较长。他类是者尚众，不遑举缕。辄为签校。附之卷末，尘山露海，倘有裨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开明书店编辑部。”这是锡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御览》中所引《文心雕龙》来校，补正范注谓“汝阳王不知何帝子”之疏漏。锡琛先生在这篇《校记》里不署名，读者不知道锡琛先生最早用宋本《太平御览》来校《文心雕龙》，也不知道锡琛先生曾校正范注。谨在这里加以指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重印范注，后附《校记》，对《文心雕龙》全书，皆用宋本《太平御览》所引《文心雕龙》文作校，但没有锡琛先生《校记》，全文列前，这是难得的。

解放后，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也转去了。1961年，《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编者丛林中先生找我选译《文心雕龙》。按照他的要求，译文要便于和原文对照，起到句解作用，简化注释，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译文就排在正文下，简注附后。为了便于阅读，在每篇前加一些说明。在这年《新闻业务》第5期上开始发表，直到1963年第8期止。译文发表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约我注释《文心雕龙》，不要译文。这个注释，自然比选译的简注详些，又把选译前的“说明”，改为注后的《说明》，也加详了。又写了《例言》和《前言》。接着，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要我把选译交给他们。注释和选译都在“文化大革命”前交去了。“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4月，在昆明召开古典文学理论学会，我因选译过《文心雕龙》，也被邀了。在这以前，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我在选译中的错误。按我的选译，主要依靠范注，如《总术》篇：“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范注：“动用挥扇二句，未详其

义。”注文可说“未详其义”，不注了。选译时只好勉强译，自然译错了。杨先生指正我的错译，提出新解：“语既承上张琴句，其文必与鼓琴事有关。《说苑·善说》篇：‘雍门子周以琴见于孟尝君。……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徵挥羽角，初（原误作‘切’，据桓谭《新论》改）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歔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如改‘用’为‘角’，改‘扇’为‘羽’，则文从字顺，涣然冰释矣。’”杨先生既指正了我的误译，又补范注之缺，极好。再说我去昆明开会，与杨先生住一间房，看见杨先生随身携带他著的《〈文心雕龙〉校注》，在书的天地头和旁边的空白处，写满了蝇头细楷。杨先生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就对范注作了补订。他在燕京大学进修时，就用《〈文心雕龙〉校注》作为毕业论文，到1957年，再加补订，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校注》出版后，杨先生继续校订，注满在这本书上，先后相继，在当时已经经过了四十多年，杨先生对《文心雕龙》校注所下的功力，当是无与伦比的了。当时杨先生告诉我，他有一篇补订范注的文章，投寄中华书局《文史》。我说回京后，想找这篇文章来读，用来补订我的注释，请求杨先生同意，杨先生慷慨地同意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都把我交去的注释和简译退还给我，要我修改。这样，我就把杨先生文字补订条目可采的引入我的注中，注明杨注，减少拙注的误差，这是非常感谢杨先生的。杨先生的补订稿，已在198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称《〈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在修订注释时，写有《例言》，说明人民文学编辑陈新同志审订拙注时，对范注也有拾补。如《颂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范注：“纪传后评者，谓《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云作《五帝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本纪》第一之意。《汉书叙传》亦仿其体，而云述《高祖本纪》第一。”陈新同志认为“纪传后评”即本纪、列传后面的评语，“亦同其名”，指《汉书》也同样称为“赞曰”，非指自序后的自述作意。又《风骨》“务盈守气”，陈新同志认为“守气”本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论周单子“视下言徐”，以为“无守气矣”，“其将死乎？”“守气”指“生气”，范注未注。我也指出《书记》篇：“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范注引《文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作注，以书为赵至写的。按此书开端称“安白”，明非赵至书。《文选》五臣中，李周翰注据干宝《晋纪》，定为吕安与嵇康书，与“安白”相合，又《文选》向秀《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纪》，亦称吕安“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司马昭）恶之，追取下狱。康理之，但死”。亦谓是吕安与嵇康书。书中称“披艰扫秽，平涤九区”，要推翻司马氏的篡夺政权，吕安与嵇康因而被杀。康子嵇绍讳言，改为赵至与嵇茂齐书。萧统与刘勰于此均为失考，因加注改正。

《选译》出版后，中华书局要我把“选译”改为“全译”。我也感到《选译》对二十篇文体论，只译了“文”和“笔”两部分的前三篇，说明对文体论的认识不够。现在看来，《文心雕龙》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像刘勰在《序志》里批评各家文论的“各照隅隙”，他要“弥纶群言”，对后来说的经史子集四部书没有不包括的，也像他的编定经藏，“区别部类”。在“弥纶群言”时，“论文叙笔，则圃别区分”，先从文体论入手。在文体论里，“敷理以举统”，敷陈各体文的创作理论，再归纳为创作论。因此，创作论是从文体论中概括出来的，没有文体论就很难作出创作论，更难建立全书的体

系。因此补译文体论是必要的。

补译了文体论，想再加点什么新的东西。想到在参加古典文学理论学会和《文心雕龙》学会时，听到有些同志要求编《文心雕龙》术语解释，他们认为对《文心雕龙》的术语解释颇有分歧，影响对《文心雕龙》的正确理解。假使对这些术语，就它们在书中出现的次数，总起来看，作些解释，是适应读者的需要的，因此尝试来做一个。由于书中术语，就它在书中出现的次数总起来看，有时作一般词语用，有时作术语用，这两者又相关，解释时似应都注意到，又术语的范围不容易确定，因此称作“词语简释”。

在《词语简释》的《例言》里指出对“道”字有不同解释。如黄侃《札记》引《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又认为非“一家之道”，作为一家之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注：“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黄注认为非“一家之道”，范注认为即儒家之道，“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两说不同。就全书看，刘勰写了《征圣》、《宗经》，圣主要指孔子，经主要指儒家的“五经”，所以他讲的道，主要指儒家之道。但他在《原道》篇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又有取于道家的主张自然。在《论说》篇，他又有取于“般若”，胜过“滞有”“贵无”只看到一方面，只有佛说能看到全面，他又有取于佛家之道。所以黄注和范注两说都有理，不过刘勰是论文原道，从论文角度说，只能有取于儒家之道，比方儒家有《春秋》与《礼》，是讲历史与礼制的。讲道家的道或佛家的道或其他诸子的道，就没有写历史与礼制的。就论文角度说，他讲的道主要是儒家的，不过也兼采道家

《文心雕龙》二十二讲

的自然和佛家的般若来补儒家讲道的不足。他在论文原道，在《论说》篇又指出写文章要“师心独见”，要创造，不能依傍儒家或道家。他在《诸子》篇称：“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认为依傍儒家思想来创作或著作就不行了。他在《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迭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用道家思想来写也不行了。这样较全面地来诠释，才能看到刘勰对道的看法，理解他的用意了。

不过《词语简释》中的解释，有的还不够全面，还需要作补充。如《词语简释》中的“奇释”，只对“奇”作了简释，指出“奇”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有无所谓好或不好的一面。这样讲是不够的。因为刘勰还讲到“奇正”，光讲“奇”而不讲“奇正”是不够的。因此“奇正”还应作释。对“奇正”，有寇效信先生的《释“奇正”——〈文心雕龙〉札记之一》，有王英志先生的《也释〈文心雕龙〉之奇正》。先看寇先生的解释，王英志先生对寇先生的解释作了概括，并指出它的不足处。王先生说：

……刘勰的“奇正”观到底提出了文章的什么样的“总的特点和要求”呢？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释》（《释奇正》）的回答是：在构成文章的四个因素（意、事、辞、风格）中皆各有“奇”与“正”之分，因此《释》具体阐释了何谓“奇”，何谓“正”，以论证这是“观奇正”的全部含义。《释》把“观奇正”理解为对“奇”与“正”分开来加以对比考察，应该说这对于人们认清“奇”与“正”的各自内容是有价值的，对于探讨“观奇

正”的内涵也有所启迪。但是严格来讲……与刘勰“四观奇正”的本意尚有距离。……

总的说来，王先生要探讨“刘勰的‘奇正’观到底提出了文章的什么样的‘总的特点和要求’呢”？王先生的结论，认为刘勰“四观奇正”的特点和要求是：

……这是应当倡导的“执正驭奇”的创作倾向和写作准则。相反，对那种不考虑文章思想内容之雅正，有悖于儒家“正道”，片面追求怪异的表现方式与出格的修辞方法、清异的词彩之“逐奇失正”的不良创作风气则必须扫荡，必要时药之以“采正弃奇”。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四观奇正”之“奇正”的较为全面、深刻的内容。

对于王先生这个结论，我们要看看什么是刘勰认为“有悖于儒家‘正道’”之奇了。刘勰在《辨骚》篇里指出：“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乐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刘勰认为这里的“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有悖于儒家‘正道’的奇”，那么是不是要“采正弃奇”呢？王先生认为不是的，他说：

……这种观点当然是刘勰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实际上所谓“狷狭之志”乃是屈原的爱国之志，“荒淫之意”也未尝不是对楚宫廷生活的揭露，并未“失正”。……